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 东 主编



儒学与女性

CONFUCIANISM AND WOMEN

「美」罗莎莉 著
丁佳伟 曹秀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 东 主编

CONFUCIANISM AND WOMEN

儒学与女性

「美」罗莎莉 著
丁佳伟 曹秀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与女性/(美)罗莎莉著;丁佳伟,曹秀娟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1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 Confucianism and Women;
ISBN 978-7-214-15004-2
I. ①儒… II. ①罗… ②丁… ③曹… III. ①儒学—
关系—妇女学—研究—中国 IV. ①B222.05②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 第 010413 号

CONFUCIANISM AND WOME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by Li-Hsiang
Lisa Rosenlee
Copyright © 2006 b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4-545

书 名 儒学与女性

著 者	[美]罗莎莉
译 者	丁佳伟 曹秀娟
责 任 编 辑	张惠玲
装 帧 设 计	黄 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页 4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5004-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目 录

鸣谢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儒学、中国性以及“仁”的道德人格 15

孔子之前的儒者：“儒”和它的模糊起源 18

“儒”、国家和中国性 27

典型的“儒”：儒家道德伦理中的“仁” 39

第三章 阴阳、性别特质及其互补性 51

阴阳和男女对立二元 56

阴阳与关联宇宙论 58

阴阳互补与性别层级 64

第四章 内外、两性之别与恰如其分的礼仪 80

内外、礼仪化与文明 82

内外、功能区分与层级性别体系 92

第五章 妇德女教类文本与女性所独有的“内”领域 109

《列女传》、《闺范》和女性传记的传统 110

妇德女教类文本之《女四书》 118

对于女性文化的质疑与“妇言”之德 127

第六章 儒学与中国的性别歧视主义 135

性别压迫和儒家道德伦理 139

案例研究：守寡和缠足 147

第七章 儒家女权主义：“女权主义”道德的酝酿 169

性别问题和女权主义政治 170

儒家女权主义的概述：一种混合特质 173

反思与总结 181

参考书目 183

第一章 导 言

在 20 世纪早期,探讨性别压迫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清代晚期参与维新运动和民国早期参与五四运动的士人充分利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无以名状的痛苦作为新兴民族主义演说的一部分。这也是在新兴崛起的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目睹中国无数次失败与耻辱的新一代人亟需探讨的问题。缺乏文化的中国农村女性普遍地受到父权制大家族的压迫,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儒家封建伦理的支持,从而使其成为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标志。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替代无力抵御西方入侵的旧价值体系。尽管拿什么来代替旧价值体系在当时尚不明确,但什么应该被丢弃却是十分肯定的。在民国早期的民族主义探讨中,反孔的呼声很高。在政治层面上,儒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清除。这种行为被视为“新”中国、现代中国以及进入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开始。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批判了儒学,并将其视为中国衰落的根源所在。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探讨,相应地奠定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和亚洲学者将儒学视为中国历史上性别压迫之根源的认识基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设想将中国女性解放进程与西方文化

传统相趋同的女权主义者和亚洲学者,对中国性别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① 女权主义者对于中国女性境况的关注和描述构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建构一部全球通史来证实女权主义者反抗西方男权社会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合理性。跳出西方世界,女权主义者试图证实性别压迫问题的急切性,并将他们的视野扩展到生活在第三世界中不幸的姐妹们。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著述中表达了他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美好期盼,即希望建立一个超越文化、地理、宗教和种族界限的全球妇女团体。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认知水平能够对“性别”的概念进行比较清晰的解构,但在性别概念尚不明确的跨文化研究中,“文化”的概念仍处于边缘化。女权主义者的著述缺乏对文化因素的关注,这对真正理解异国性别体制构成了障碍。在他们的著述中,性别被寓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背景中。的确如此,我们的概念框架建立在世界第一次成为我们可认知之对象的基础上,而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内涵只是通过网络所分享的有关世界本质的文化假想。因此,在任何试图理解异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差异性”,同时抑制我们强加于它的文化假想。

在中国,假想出的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由儒学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传统思想所构成。尽管在这个识时务的时代,对于儒学直接而霸道的评论已然不再呈现。但是在西方人种优越论的理论背景下,有关性别平等问题的霸道评论仍旧不断呈现。在儒学作为一种女权主义理论的可能性尚未得到女权主义者和汉学家认可的前提下,无论他们是否对儒学表示出赞许,其本身都暗示着与性别相关的西方传统理论的虚构优越性。他们自然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儒学? 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将试图为学者们提供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来设想儒学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可能性。然而,通过对儒学的甄别,我们并不打算将多样的中华

① 此处所用“西方女权主义者”主要涉及一种将中国女性的自由同西方文化传统相趋同的意识倾向。就此而言,具有中国血统的女权主义者或汉学家将会落入“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范畴,而欧美女权主义者或汉学家将超越这一范畴,其程度与他们的意识倾向有关。因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西方学者所持有的立场而什么又是中国学者所持有的立场。

文化修整成单一的传统理论。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在于证实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尽管儒学在历史现实中错综复杂并且充满歧义,但其作为道德支柱和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被不断证实着。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探讨中国社会之性别体系时并未将儒学这一复杂的传统文化作为背景假想的源泉去理解。实际上,他们简化了“女性”的分类,构造出普遍概念框架中常见的西方性别范例。在此框架下,中国女性所处的状态是被塑造的并且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获得解放的。

如果跨文化研究是以真正的跨文化取代单一文化,那么其他文化都将归入西方概念框架中。“文化”因素——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的背景假想——必须获得应有的尊重。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社会赋予“中国女性”作为性别和文化的象征。如果我们以每一种文化都是可行的,并且性别构造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具有真实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为前提,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强加于其他文化既而全面排斥其他文化传统的做法是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我们试图研究的课题。更糟糕的是,它证实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其他所有的文化都有可能被归入这一概念,尽管它们存在着片面的、经验上的差异。真正的跨文化研究必须始于对另一种文化的好奇,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不能也不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体系所削减或替换。否则,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自身的伪装便显而易见了。正如康德所言,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是我们主观形成的而不是世界本身的客观真实。同样,并未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女性受害形象的普遍认知更多的来自于假想。这种假想就是西方观察者正在构建的一种他者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脱离了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女性。如果文化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体系,即不但标志着其他文化差异性的不可削减,而且渗透于生存方式、知识、物质生活等日常生活中,那么任何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抽象概念和文化实践必须与它们本身的文化传统相适应,这些传统构成了另一种背景理念。在中国的性别研究中,哪怕是

最为微小的敬意都应该给予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儒学。^①

简言之,本文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四点:首先,最为重要的是阐明儒学的文化传统——复杂而模糊的起源以及它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它与众不同的道德理论即代表高尚人格的“仁”。再者,展示中国社会由儒学所塑造的文化概念系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语汇,如“阴阳”、“内外”,以及在帝国历史上独具传统的女性传记和由女性或为女性而书写的妇德女教类典籍中的文学传统,这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性别构造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设想中国性别体系与儒学之间的可能性关联。在此关联下,儒学的贞洁伦理不仅与其共存而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共同支撑着中国社会的父权制家族结构。与女权主义者在传统意义上假设的第三世界女性不同,在下文中,女性不再被视为受害者或男性的明确压迫对象。相反,她们甚至加入了支持和传播男权至上理念的活动——遵循中国社会既定的文化理念。^②换言之,女性不仅被视为自然人,也被视为文化人。尽管存在结构性的限制,但她们仍然力争通过可行的方式获得文化知识。与男性可获得的文化资源相比,她们是受到限制的。最后,总而言之,我们将超越儒学中的男权至上理念和女权主义政治解构的片面评论,并将提供一个切入点即开始构想儒学作为一种可行的资源,通过表明什么是构建儒家女性观的必要步骤来推动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

作为理解中国性别体系的初步工作,我们将首先致力于对儒学的研究。在第二章“儒学、中国性以及‘仁’的道德人格”中,我们首先将早期西方女权主义著述中把儒学作为一种集体、固化之男权至上理念的认识

① 此处所论并非否认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毕竟儒学、道教和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三大基本思想体系。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不二特权是其他二者所无法比拟的。此外,试图将道教与女权主义相联系或者思索道教中的女权主义倾向,乃至探寻儒家传统中是否存在女权主义空间的努力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此处旨在敞开女权主义空间,为儒家女权主义的构建奠定基础。

② 女权主义者对于后殖民时代的探讨,参看赛斯(Signs)1995:《后殖民时代的新兴本土女权主义》或葛瑞沃(Grewal)、卡普兰(Kaplan);约翰(John)1996。

搁置一旁。在考察“儒”的含义时，“儒学”的模糊性与复杂性给我们的理解造成了困难，这意味着有关“儒学”一词不精确的中文表述被 18 世纪的耶稣会会士所使用。在帝国历史上，“儒”在知识领域的重要地位与其语义的模糊不清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通过双关传统考察“儒”的词源时，它的特定含义就更加晦涩了。在传统认知中，“儒”之特定含义与“懦”、“柔”、“孺”、“濡”、“需”等汉字之间存在的双关联系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在上古时代，“儒”字语义起源的模糊不清使得前孔子时代作为一种知识自律的“儒”与孔子（儒学最为杰出的代言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令人费解。不同于“儒学”这一被西方世俗化、简单化的词汇，复杂的“儒”既不是统一的教义也不是孔子所独创的学说。“儒”只能大致被视为先贤的学说，而孔子（圣人和先师）的道德教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考察了“儒”的复杂含义后，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儒”在帝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公元前 2 世纪的西汉到 20 世纪初的清末，体制化的儒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而存在。在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其发展的好坏始终与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息息相关。随着以儒家文本为基础之科举制度的建立，大量士子通过这一方式被吸纳为国家官员，尤其是在 11 世纪宋朝改革之后，儒生所追求的社会地位和知识体系由国家掌握的科举制度来确定。而在科举考试中世袭的君主扮演着主考官的角色。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儒学与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意味儒学完全从属于国家权力。作为帝国历史近距离的观察者，士大夫并不掌握实质的政治权力，权力掌握在世袭的统治家族手中。此外，儒生自我标榜作为国家、圣贤之“道”和价值之调和者的社会角色要求他们超越对国家的愚忠。换言之，儒生是国家的良心和道德的支柱，而不仅仅是作为官僚机构中的摆设或办事员。“儒”含义的多变性扩展了它的释义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儒的特质在于文化而非种族。而耶稣会传教士所认同的，以及在 16 世纪末期之中国被士大夫社会所接受的“儒”只是“儒”或“儒学”多变性含义中的一部分。

尽管“儒”的含义具有模糊性而“儒学”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仁”作为传统儒学的核心伦理观念是确定无疑的。相关的人格概念与“仁”的伦理观念紧密相扣,通过儒学而进行的自我修行共同为获得个人道德成就奠定了基础。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把握人际关系、践行与特定社会关系相称的美德从而获得道德人格的文化理念对两性而言都是开放的。尽管儒家“仁”的道德伦理观念之开放性或相关人格与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与没有考察中国的性别体系就无法理解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一样。在中国的性别体系内,男女的性别认定取决于构建合理之性别体系的特殊文化背景。

在第三章“阴阳、性别特质及其互补性”中,我们将对西方把“女性”作为一种亲属关系内的中立范畴之普遍观点提出再批评,这种中立范畴通过女性特质和先天生理机能来定义。在中国社会中,女性特指妇女(妇,已婚女性;女,年轻女孩儿),她们被彻底限定于家庭关系之中。换言之,相对于西方将“女性”一词表达为一种优先、独立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自然存在,作为妇女的中国女性主要以家庭、亲属角色被认知。在儒家传统中,生物学上唯一存在性别差异的男、女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动物而非人类。性别在人类社会中意味着严格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通过扮演不同的家庭、亲属角色,“妇女”作为一种性别属性被构造出来。也就是说,亲属体系中的仪式化进程与性别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被儒学建构的中国性别体系必须置于层级亲属体系中去理解。而层级亲属体系中形成了对“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性认识。因此,在中国社会,性别差异不应该依据诸多先天特性所指定的社会学范畴上的男人和女人,或生物学范畴上的男性和女性来划分。

西方女权主义者有关中国性别问题的探讨主要基于阴阳隐喻和男女二元之间存在的关联,阴阳理念被视为中国性别体系的标志。“阴”的容纳特质和“阳”的扩展特质被视为中国女性从属于家族的理论基础。但是,将阴阳隐喻在概念上等同于西方男女二元范例的举动不仅把一种二元式理论体系强加于中国相互转化之阴阳宇宙论上,更为严重的是,

这样的举动必将对中国社会性别压迫之根源产生错误的认识。不同于西方男女二元范例,“阴阳”作为一种非对抗的互补双体无法成为中国性别压迫之根源而发挥作用。相反,这种存在于宇宙和人体中不可缺少的、互补的阴阳观,实际上创造出一种在男女身体间流动的性别差异观。因此,在中国社会内似乎暗藏着一种对于性别角色更为宽容的理念。但在实际上,流动的阴阳双体与中国社会性别体系的僵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第四章“内外、两性之别与恰如其分的礼仪”中,我们将以探讨内外空间作为研究中国性别体系的出发点。类似于阴阳隐喻,“内外”常常等同于两组相互对抗或斗争的领域——家与国或私与公。因此,“内”与“外”之间的差别似乎意味着严格地将男女身体分隔到两个相互冲突的领域。然而,将“内”与“外”轻描淡写地视为一种个人、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静态分隔是不充分的。在涉及两性关系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内外理念已经获得了关注。这些研究显示,女性如若逾越了预设的内外界限将会受到社会的惩罚。此外,在中国社会内,家与国或私与公并不是两个相互分隔的领域。相反,家是构建和谐之国的基础。作为个人美德的“孝”是所有公共美德的源泉。因此,与互补的阴阳二元相类似,“内”、“外”之间的界限也是可以协商的。

内外理念意味着一种功能性区分。它对性别空间作了恰当的定义并且将劳动分工作为划分性别的基本标准。尽管内外界限主要是一种仪式性界限,它的调节目的在于将女性正式地划归家内领域——家内技能和家务管理,而男性则被划归家外领域——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层面上而且落实到社会现实中。换言之,由于内外作为一种功能性区分或调节性典范,各阶层之女性都不被允许正当地拥有进入“外”领域(文化、官场)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裹足于“内”领域之才华横溢的女性必须隐藏她们的才华,因为这对于她们在家内领域中的性别认定和角色扮演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在第五章“妇德女教类文本与女性所独有的‘内’领域”中,我们将通

过对贞洁烈妇之传记和妇德女教类文本——由女性或为女性而创作——等独特传统文化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女性在“内”领域中的性别认定和对“外”领域文化追求之间的自然冲突。不同于西方世界,有关女性文学的问题,中国社会并不过多关注女性是否应该受到教育或女性的先天智力,而是将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女性性别身份的恰当性上。顺从、受压迫和缺乏教育是中国女性极具代表性的特征。代表中国女性的早期文学建立在《列女传》的传统基础上,贞洁烈妇之传记组成了王朝历史的一部分,但它所显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些传记中,并不缺乏被建构的典型,例如,道德高尚的母亲教育其年幼的子女有关国家政治和得体的礼仪,或者勇敢的女子驳倒她们的长辈,或者才华横溢的女性善于辩论。在早期文学作品中,中国女性被表述为智慧与美德的代表,并且超越了她们被限定的家内领域——家内技能和家务管理。

但在实际上,建立在刘向《列女传》基础上较为宽泛之无性别特征的美德,例如辩通、仁智和贤明等,在帝国晚期尤其是明清以来流行的插图版本中已经转化为狭小范围内特定性别之专有美德。特别是贞洁、婚姻忠贞等美德被广泛普及,在帝国晚期表现女性美德的作品中,它们甚至超越了无性别特征的美德。文学作品中女性美德主旨的转变可能并不是官方文人有意释放的保守主义信号。瑞丽(Lisa Raphals)在有关中国女性之早期代表文学的研究中指出:“促进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仅仅在于印刷版本中刻有自我牺牲的母亲、孝顺的女儿和坚贞的妻子等悲剧内容之插图所带来的情绪感染力和消遣价值。”^①随着元代守寡行为的制度化和明末清初的政治动乱,妻子的忠贞类似于男子的政治忠诚,贞洁或忠诚等美德逐渐成为王朝《列女传》和妇德女教类文本中最具典型性的女性美德。

尽管越来越强调女性的忠诚和坚贞,但女性文学却在明末清初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女性作为作者和读者的合法性在“内”领域中被确认,这

^① 瑞丽(Lisa Raphal)1998。